

# 回望故乡：一抹夕晖下的乡愁

——读米兰·昆德拉长篇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杨焕亭

(咸阳市作家协会 咸阳 712000)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 (2022) 01-0017-05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01-017.html>

1995年秋天，经历过东欧剧变的捷克政府，决定将捷克国家最高奖项——功勋奖颁给已经旅居法国20年的作家米兰·昆德拉。这对于漂泊异国他乡的昆德拉，是一种心灵和情感的抚慰。在回答捷克《人民报》记者的提问时他说：“我很感动……把这次授奖看做是给我与祖国和祖国与我的关系，画了一个句号。”这种表达耐人寻味，既含着对祖国没有忘记自己的感谢，又含着他对祖国深深的依恋。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被认为他到国外以后发表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品以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20世纪60年代末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为背景，以苏军占领下的布拉格为环境，刻画了在特殊年代，外科医生托马斯和女友特蕾莎、情人萨比娜及另外一个男人弗兰茨在生命价值的“轻与重”、灵与肉的“合”与“离”的矛盾冲突中度过一个个风雨迷离的日子的命运历程，而作品选择的板块式结构，哲理性视角和融叙事与议论于一体的表达方式，无疑给读者带来多重的审美感受。

—

对于生命价值的诘问，成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视点。

作品开篇，作者就以哲思的视角把关于生命的意义的命题提到了读者面前：“永恒轮回之说从反面肯定了生命一旦永远消逝，便不再回复，似影子一般，了无分量，未灭先亡，即使它是残酷、美丽，或者绚烂的，这份残酷、美丽和绚烂都没有任何意义。”这正是昆德拉之与以故事展开叙事的作家的不同处，仿佛一位思维缜密的导游，把读者带进自己即将展开的故事发端。接着，作家用了两节的文字，就这个命题展开思想的神游和言说，而作品的男主人公就在这样的氤氲中背负着“轻”与“重”“灵”与“肉”的相融相悖走进了读者的视野。

托马斯本来是一位外科医生，在苏军没有入侵以

前，他的生活总体上来说是比较安定的，他以自己精湛的手术、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不仅赢得了患者的赞誉，也得到科主任的青睐；不仅在事业上展现出明丽的前景，而且成为众多女人追捧的对象。即便是在苏军强力的统治下，只要他对政治疏远而淡漠，他的手术刀仍然会成为他谋生的手段，日子也会过得不错。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血还有温度，这使他时不时燃烧起对现实的愤懑，终于因为写了一篇发表在周刊读者来信栏目中的政治性小文而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先是为逃避迫害而躲到一个小镇上去当一名普通大夫，继之，因为婉拒了“内务部”官员要他就发表的文章再发一纸否定声明的要求而最终被逐出医疗行业，成为一名奔走在业主中间的擦玻璃临时工。这是他生命价值第一次跌宕式的“轻”“重”旋转。而问题还在于，与肉体的轻重旋转和倾斜相联系，他的灵魂日益走向轻薄。他试图以“有性无爱”来寻求精神苦闷的解脱，不惜将特蕾莎的爱抛向一边而沉湎于借擦玻璃之际猎艳泄欲，在与一个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做爱”中，用生理快感去麻醉心灵。生活磨掉了托马斯身上的锋芒，因此，在被禁的周刊记者和他的儿子征求他在《2000字》请愿书上签名时，他选择了退缩和放弃。并且在内心深处对自己当初的反抗选择，做了理性的否定，从而给本来因为那篇文章而对陌生父亲依稀产生尊敬的儿子心灵地板上涂下了一抹阴影。

表面上看来，他为拒绝签名寻求的理由是要告别“生命之轻”，去与特蕾莎过一种“小牧歌”式的生活，“为何还要考虑要不要签名？他的所有决定都依据一个标准：不能做任何可能伤害特蕾莎的事情”，“如果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几乎可以肯定，警察骚扰她的次数还会更多……”尽管有论家认为，这种放弃是托马斯的“性格使然”，然而，从生活哲理层面辨析，内因从来是变化的依据，但外因同样是变化的必然条

作者简介：杨焕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原咸阳市作协主席。

件。托马斯走向纵欲、萎缩的人生跌宕充分说明，个人命运在任何时候都是同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国家丧失独立和主权时，它的有良知的国民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孤立地把握自己命运的枢机。用被禁周刊记者的话说：“俄国入侵以后，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剥夺了工作，成了擦洗玻璃的、看停车场的、门房守夜的，给公共建筑烧锅炉的，最好的是开出租汽车的，因为这还需要门路。”正如昆德拉在作品中感叹，连总统杜布切克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都不能不屈辱地在“自己国家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遑论托马斯这样的百姓呢？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托马斯选择退缩和怯懦的理由，归根结底，还在于他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的对生命价值的宿命性解读：“如果生命的彩排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有什么价值？”托马斯没有对此给予终极的回答，却陷入一种不可知论的虚空，在他看来，“正因为如此”，所以，生命对于人，不可能有明晰的彼岸或者完美的结局，“永远是一张草图”。

沿着这条思路，昆德拉为托马斯设定了死于“车祸”的人生结局，从而让恬静的、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做了他生命的挽歌。在某种程度上，托马斯成为寄托昆德拉祖国之恋的文学意象，“同诗人一样，小说家也运用意象来表达不同程度的效果……或者揭示一种心理”。（刘易斯语）托马斯的悲剧命运成为捷克历史沧桑的一种隐喻，一种象征，一种含着泪水的“哀思”。而且，伴随着之后的东欧剧变，作者的这种吊祭更具悲剧色彩。

## 二

对信仰的反思，构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叙事抒情的重要方面。

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视为一部哲理小说，这几乎是国内评论界的共识。作者在整个小说结构中，先后两次以“轻”与“重”“灵”与“肉”为板块命名，从而为作品注入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维，他试图通过作品中人物个性的遭际、多元的心理和多变的行为方式去揭示特定环境下人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关系——人与自身的矛盾和冲突。

其实，这不过是他在“布拉格之春”的思想的延续而已。

当从“布拉格之夏”“到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风潮到来时，昆德拉还在国内，就在“布拉格之春”剧变发生的前夕的1967年6月，在捷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为主席团成员的昆德拉发言，批评

捷克文学丢掉了中部欧洲文学的传统，成为枯燥无味的宣传品。而更重要的是，他在追究这种流失的原因时，将纳粹德国的入侵与弥漫于捷克全境的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断言捷克文学受到了“威胁”。据此，他在会上提出，要给文学以自由发展空间，废除检查制度。不难看出，他把《玩笑》中的所思提到了社会面前。他的发言很快就获得了不少作家的响应，尤其是得到了当时党内“改革派”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布拉格之夏”。这一年12月，昆德拉又发表了《捷克的命运》一文，进一步阐发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从10月起掀起的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遇到了当局的镇压，引起党的队伍的迅速分化。党内的“改革派”杜布切克在1968年1月启动了“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方案提出“多元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主张“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然而，昆德拉及其发起学运的大V们没有想到，他们推波助澜的结果，没有给捷克社会带来真正的变革，却导致了苏军的大规模入侵。

在历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沦入资本主义的风潮后，会发现，“布拉格之春”不过是西方势力“颜色革命”的一次预演而已。然而，苏联的出兵，却使得这一本该是国内的矛盾国际化和复杂化。这里，当然不乏两个阵营之间的尖锐对立，但同时也暴露出苏联政府的霸权主义思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压力，它迫使杜布切克政府在“协议”上签字，不仅宣告“改革”失败，更让捷克与斯洛伐克从此以“联邦制”的政体出现在中部欧洲，从而为这两个民族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分为二埋下了伏笔。

悲剧的实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一直向往“自由”和“民主”的昆德拉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与当初的追求背向而行，在故国并不辽阔的土地上招来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存在。这无疑很让他失望和伤感，因此，他开始用回溯的目光清理这一段经历。他惊异地发现，从“布拉格之夏”开始，捷克人的信仰急剧分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作者以哲学家的理性，艺术家的笔触对当时分散的抵抗做了再现性的描写。他们各自的目的和对象并不尽相同。有的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去对抗外部入侵，有的是以“自由”为口号，不仅反对外敌，也反对现存的体制；有的并不想进行有组织的反抗，而只是用一种消极的人生在沉默中度过一个个压抑的日子，从来没有形成一支意志统一的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软弱”的特蕾莎在作者笔下,是一个“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形象。作为一个女人,她一生都在追求一种真正的,没有任何遮蔽、没有欺骗的爱情。作为一个公民,她也有过热血沸腾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与摄影结缘。这个本是出于兴趣的爱好,却使得她在苏军入侵第一周,勇敢地拿起相机,毫无畏惧地记录下苏军坦克驶过布拉格街头时的碾压和人们面对亡国的麻木和狂欢。她很吃惊,人的生命在一瞬间变得如此轻飘。然而,作者并没有刻意将之塑造为一位爱国的英雄。特蕾莎的行为完全出于人的“本能”的恐惧,是一种对故乡的朴素的情感驱使。其背后,缺乏的是信仰的支撑。因此,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十分忌讳有人提起这些并不淡远的往事,并且重新坠入与托马斯那种逆来顺受的爱河中。托马斯一句“把衣服脱了”,就可以使她兴奋不已。甚至最后说服托马斯带着宠物“卡列宁”到乡下去过一种小“牧歌”式的生活。不难看出,特蕾莎这个艺术形象身上,承载了昆德拉对捷克“国民性”的沉重忧思。

如果说,在昆德拉的艺术视域中,特蕾莎表现了对生活信仰的盲目,那么,在作品中另外一个女主人公萨比娜身上,则表现出极端的固执、分散和多元。作者认为,“她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因为轻。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她的人生观,用情夫弗兰茨的话概括,就是“活得真实”,但什么是真实呢?是“消除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之间的阻隔”吗?显然,这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不能成立。弗兰茨就批评她个人隐私与公众生活不能混为一谈。是“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美”的真实性,以至活着的真实性都要大打折扣。持着这样的认知,她对于苏军导演下一年一度的“五一节”游行持一种叛逆的姿态,“为了逃避游行,她常常一个人躲进厕所”,而她之所以在教堂里感受到“美”,是因为将那种唱着赞美歌的氛围与终日歌声喧嚣的青年工地置于相比较的地位。因而有时候生发出遐想,“美就隐藏在五一节游行的背后。”要发现美,“就必须把那场景击破”。与特蕾莎一样,萨比娜也曾经以自己的绘画作品抨击苏军统治下的捷克,并且不止一次地在特蕾莎面前提起她早年拍下布拉格街头的陈年旧事。

然而,这一切“背叛”行为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呢?显然不是出于对祖国或者民族的信仰,而只是寻找一种“自我存在”的方式,并没有将之融入为民族独立而“叛逆”的“生命之重”中去。她试图在“被背弃的世界”寻找美,这种模糊的美学观导致她陷入命运

的虚无。有论家以为,萨比娜的背叛,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随机性”,不无道理。她一生都在反对“媚俗”,但到终了仍然没有走出“媚俗”。以致因为与一对年老夫妇聚餐之后,忽然想到“在步入老年之际”的许多事情,似乎又找回了“幼时被夺去生命的父母”,“虽然终生未育,但此时又拥有了孩子。”(指将老年夫妇‘童年化’的幻觉)。到这里,她开启了又一次的“背叛”,在她的心灵深处,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不时奏响那首荒谬但感伤的歌曲,向人诉说,“在两扇闪亮的窗后,生活着一个幸福的人家。”在经历了一场“生命之轻”的循环后,她又一次回到了生活的原点:“‘媚俗’一旦失去其专横的权力,它就像人类任何一个弱点一样令人心动。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她最后甚至以为,“不管我们心中对它如何蔑视,媚俗总是人类生活境况的组成部分。”诚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信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众多的力量之一,若是没有它,便意味着崩溃。”她后来移居到了美国,竟然惊异地发现,“从音乐到噪声的变化是中全球性的过程,令人类进入了极端丑陋的历史阶段。”而“媚俗”所唤起的一系列遐想之一,就是“遭背叛的祖国。”这也许正是米兰·昆德拉在远离祖国后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咏叹吧!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信仰倘就没有充分依据,那不过是迷信自己而已。”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以不同形式抵抗苏军入侵,不只是萨比娜,也不只是在报刊上发了政治性文章的托马斯,还有被禁的周刊记者和深受身为捷共党员母亲的影响而走上反抗之路的托马斯的儿子。他们试图发起一场签名活动,希望苏俄当局善待政治犯。显然,这是一个临时的联盟,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一种和平运动赢得当局对政治犯待遇的改善,而表达的方式就是为《2000字书》征集签名。连托马斯都认为这是一种无效劳动,因为没有哪一个傀儡敢于违背苏军意志去赦免政治犯。但他的儿子却认为,他所追求的是“要让人明白,这个国家里还有一帮男女无所畏惧,要表明谁跟谁站在一起,要好麦与毒麦分清。”这话是对杜布切克政权说的,就是希望这些权力拥有者明白,人民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应该分清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从而敢于对苏联说“不”。应当说,这是在小说中能够看到的唯一有目的的集体行为。他们澎湃的热血让读者感动。问题在于,他们的自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凭什么就断定请愿一定能够成功。



仅仅依靠对天主教的皈依，而没有建立在国民精神基础之上。缺乏核心价值观支撑的行为，离开信仰奠基的行为，必然陷入盲目或者纷乱，或者在遭逢挫折时人心离散。连周刊记者都不相信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知识层会在请愿书上签名，足见其行为的自发性和零散性。果然，很快地，几乎所有的舆论都在谴责这次行为。原因就是在苏军存在的条件下“所有的公众行动（集会、请愿街头示威）除非由党组织，均属非法，参与者都会置身于危险境地。”在作品中，昆德拉并没有将拒绝签字的托马斯置于谴责地位，这多少寄托着他的无奈思绪。

### 三

通过文学意象去反思和批评苏联传统体制，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苏军入侵后，昆德拉不仅遭遇了被开除党籍的处理，而且他先前的作品如《玩笑》等都被列为禁书。于是，他在1975年前往法国，并于1978年加入法国国籍。这一去就是四十多年。2019年12月3日，捷克共和国驻法国大使彼得·德鲁拉克告诉捷克公共电视台，共和国已经恢复昆德拉的捷克公民身份。德鲁拉克这样评价昆德拉：即使在流亡中，“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身份，我想说，他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捷克人。他和这个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对捷克共和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有资料显示，除了在东欧剧变之后的1990年，他回过一次捷克以外，就再也没有回去。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他彻底断绝了与祖国在文化血脉和情感上的联系，他在获得捷克最高文学奖后，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我随身携带了布拉格——她的味道、格调、语言、风景、文化”，成为他乡愁抒情的经典语言。这表明，故乡捷克对于他，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他将浓浓的乡愁背上行囊，带到法国。所有这些，都引发我们重新去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那些饱含隐喻意味的文学意象。

在美学层面，意象之“意”被认为是一种有意识的主观活动，“象”显然不是客观存在物，而是打上了作者审美和思想印记的艺术形象，既具有与客观之“象”的相似性，又被赋予了大于它自身的丰富的象征意味。而象征从来就是一个标示隐喻或者暗示的美学范畴。透过这些意象，可以触摸昆德拉与故国之间的恩怨和心结。

与其说，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男主人公托马斯对宾馆女招待特蕾莎的关系处于“轻”与

“重”“灵”与“肉”之间的选择纠结，毋宁说，作者借助于这种矛盾和冲突曲折地折射出自己对捷克五味杂陈的情怀。特蕾莎“既不是情人，也不是妻子，她只是从涂了树脂的篮子里抱出来，放在自己的床榻之岸的孩子。”这正是处在冷战集团之间的小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尴尬地位。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言，它不是“情人”，而被视为跟在苏联身后摇尾乞怜的“仆从”，然而，在苏联人眼里，“她”也不是妻子，时时刻刻警惕着“她”与别的“男人”的暗送秋波。于是伴随“她”的就是做不完的噩梦，是战战兢兢的观眉说眼，“睡梦中，她呼吸沉重。她攥着他的手”，到后来“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腕、手指和脚腕”，“好像那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这正是1968年苏军入侵后捷克政府现状的形象描写，整日处在担心被人出卖的恐惧之中。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使得昆德拉试图在“动物”身上唤回人类流失的忠诚。在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生活中设定了两个意象，一个是受了伤的“乌鸦”，它在生命垂危的生死线上挣扎，期待有善良的救助者出现，是捷克悲剧命运的“象征体”。一个是形影不离的宠物狗“卡列宁”，它忠于主人，从不为只给了它一只羊角面包而生怨气。直到最后，死在特蕾莎的怀抱里。昆德拉给作品最后一章的命名是“微笑的卡列宁”，并且不惜笔墨，满怀深情地描写对卡列宁葬礼的隆重。读者不禁要问，留在卡列宁嘴角的最后一丝“微笑”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对一只动物的死去如此悲哀？这种美学意义上的比较，十分深刻，显然，“卡列宁”的死具有浓郁的隐喻意义，它代表着作者对于捷克国魂、民魂的呼唤，形成一种强烈的暗示——生活在苏军铁蹄下的捷克民族渴望一种真诚、平等和和平的生存环境，而不希望生活在一种虚伪的“性友谊”的欺骗中。明于此，《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当时的捷克政治环境中被列为禁书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如昆德拉1984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随着俄国的占领，我们被孤立了……”

的确，1968年苏军的入侵，成为捷克人心中永远的历史痛伤，也引起他们重新看待昔日心目中作为“楷模”的苏联体制的思考。这些，当然也毫无例外地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得到了反映。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会惊异地发现，在苏联传统体制的影响下，捷克经济、社会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节日标语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其实，中国人反思斯大林模式比捷克人要早得多。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曾经对胡

乔木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在苏联入侵捷克 10 年后的 1978 年，邓小平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昆德拉以艺术的目光对苏联体制的反思。

这种反思虽然还没有触及苏联体制的本质，但它是文化层面的批评。作品不仅用了不少篇幅去揭露“自俄军占领托马斯的国家五年来，布拉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托马斯在街道上遇到的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些人。他一半的朋友都移民走了，留下的人中也有一半都死了”，“俄军占领的几年是葬礼的年代，死亡从未如此频繁过”。昆德拉更从美学的角度思考苏联体制的弊病。作家借助于女主人公的萨比娜的感觉，为在苏联体制下的官僚主义者画像：“这类人全都长着比中指稍长的食指，说话时专用来指戳对方”，辛辣地讽刺这些人将真诚掩盖起来，而热衷于作秀，被官僚主义掩盖了人性；不无忧虑地感叹自己在美术学院学习时，只能按照一种风格一种思维模式去创作，而其他的风格都会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于在苏军重压下举行的五一节游行，“她常常躲进厕所里，等所有人离开很久以后才回去”。作为一位对苏军入侵满怀愤懑的知识分子，萨比娜声明不是反对“共产主义”，她的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反对的是被戴上“漂亮”面具的苏式体制，是罩上“媚俗”外衣的僵化模式。“媚俗”这个词，翻译界有着不同的诠释，国内学者有人主张将之译为“伪崇高”，认为是指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扭曲和异化。显然在昆德拉看来，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偏离了共产主义的本体，而异化为一种对弱小国家任意侵略的极权政治——在萨比娜的身上，留下昆德拉的思想痕迹。这让人顿然会想到心理现实主义作家欧茨的话：“读者从作品中了解的作家是‘私下的自我’，而现实生活的作家则是‘公开的自我’，创作过程是从‘公开的自我’到‘私下的自我’的过程，最真实，最有价值的自我则潜藏在人的灵魂中，这就是心理现实主义。”显然，萨比娜在这里不仅是承载着故事的艺术形象，更是昆德拉乡愁的寄存体。对萨比娜“背叛”精神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昆德拉对传统体制的忧思。昆德拉从十八岁就加入了捷克共产党，在他世界观中，不惟种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尤其深深地镌刻着对“中

欧”文化的情结。即便在被开除党籍，流落国外的日子里，对故乡的文化认同仍然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之一。“一部小说，虽然根本是自传，但也总是极富个性的，您在你的人物身上，看到您可能发生的事情，看到您可能是或者可能成为的人”，“我所关注的题材，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布拉格和我经历过的一切联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旅居法国多年的昆德拉，并不认同资本主义的体制。作者通过萨比娜移居美国后的遭遇，告诉读者，西方并不是一方幸福的土地，同样是一个政客虚伪恣肆的世界。当萨比娜看到一位与自己熟识的美国参议员看见一群孩子在溜冰场玩耍时，“他手一挥，画了一个圈，圈进了体育场、草坪和孩子们，一边说：‘我说这就是幸福’。”萨比娜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这位参议院的潜台词是，在她的国家里“草不长，孩子们也不幸福。”然而，这个貌似充满优越感的动作，却带给萨比娜另外的感觉：仿佛参议员与站在布拉格广场的官僚主义者们“对脚下同样微笑着的民众发出的微笑一样。”作家通过这一细节，不但尖锐地讽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虚伪，也曲折地对在苏联体制下，一些领导人蜕变为与资本主义议员没有两样的行为给予了批判。这种姿态，直到晚年也没有因为久居法国而改变，1984 年，他在接受法国《读书》杂志的访谈时尖锐地指出：“这种蛊惑（媚俗）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与东方”，“在西方，这种媚俗性尤其被政治派别当做媒介物，看看美国的选举活动……”，“一方面，西方的媒介和广告机器把每一个行为，无论多么勇敢，都变成了演戏，变成了媚俗；另一方面，这类演出达到最终的悖论：不再有向前逃遁的可能，再也没有进步，只有一条充满敌意的边境，它将紧紧地、静悄悄地关闭。”这也许是他始终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之一吧！这不是我的猜测，一位名叫叶竹盛的高级记者在广东一家叫做《读览天下》的网络平台上发文，传递了一种看法：“还有很多人相信，如果晚 10 年，比如到 1999 年昆德拉 70 岁的时候，东欧阵营再来垮掉，那么他应该早已戴上诺贝尔桂冠了。猎手的价值永远依靠猎物来衬托。昆德拉无疑是时代的直接受害者。”这也同时可以作为对昆德拉充满了崇拜的莫言获奖的注脚。

昆德拉终于没有回到故乡去，故乡对于他，是永远扯不断的梦，拂不去的乡愁。而他那句“即便给我机会，我也会犹豫良久，我害怕会有太多的失望和痛苦”，给人留下了许多可以研究和探索的空间。